

## 由法布尔的《昆虫记》引发的| 些思考(下)

□ 王富仁

4 我们的新文学是在维新运动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国洋务派的自然科学观念和中国维新派的社会科学观念也不能不影响到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直至现在,我们仍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争论不休。实际上,什么是文学的现代性?依我的理解,那就是建立在现代中国人的社会观念和人生观念之上创作出来的文学与尚未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创作出来的文学的不同特征。文学还是文学,文学还是诉诸于直观、直感、直觉的,还是以文本的形式进行的感情、情绪、审美态度的交流。但它已经不是原始的文学,不是中国古代社会产生的文学。为什么?因为它已经沉淀着现代的理性,它的直观、直感、直觉也已经不是原始人或中国古代人的直观、直感、直觉。否则,文学就没有现代和传统之分。在《孔雀东南飞》那样的社会背景上,焦仲卿妻的形象就是一个近于完美的女性形象,而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上,她就不会成为一个那么完美的女性形象了;在古代政治的背

景上,包拯就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官僚的形象,而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上,他就不再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官僚的形象了……社会状态变了,社会关系的状况变了,我们的一些观念也变了。这些观念构成了我们直观、直感、直觉的基础。在直观、直感、直觉中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它却已经是一个无法改变的感知事物的理性基础。鲁迅为什么在中国新文学的初期就创造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一个艺术高峰,不是因为他读了比别人更多的外国小说,不是因为他读了比别人更多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也不是因为他学谁学得更像,而是因为他对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内在情感和情绪的体验,对现代中国人,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对中国人的情感和情绪的表现,有着较之他人更真实的关切和更实在的观察。这使他不断强化、丰富着自己的感情体验和情绪体验,同时也不断积淀着自己的现代理性。真正理性的东西是扎根在自己的生命之中的,是在特定条件下自成系统、自我完满的东西。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

为了全面地深入地研究殷夫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有必要进一步发掘、整理其生平事迹和遗文译作,这当然有待于大家的劳作和努力。上述的姜馥森回忆文章,颇有不为人知的史料,发表距今已超过半个世纪了,却尚未受到注意,故特择要转述,以供参考。

注 释:

① 见《语文战线》(杭州大学编印)1981年第6

期。

② 见《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③ 见该书第142页。

④ 参阅钦鸿:《文海钩沉》,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93年4月初版,第1页。

| 九八二年十月初稿,二〇〇|年三月增补于梅陇新居南窗下。

统中,没有科学的启迪,没有理性精神的培养。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权威的支持,没有朋友的赞和,没有群众的认同,他就无法最终证明自己的一个看法、一个作品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优良的还是低劣的。只有现代科学,只有现代理性,才给予了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判断、自我肯定的方式。现代科学及其方法论就是这样自我判断、自我肯定的方式。即使一个中学生,只要他按照正确的运算方法对一道数学题进行了演算,只要他按照合理的验证方法对自己的演算进行了细致的验证,即使包括他的老师在内的周围的所有人都不承认他的演算的正确性,他也不会认为自己是错误的。他能够对自己的演算具有完全的自信心。科学方法、健全的理性使现代知识分子再也不必完全仰仗他人的判断。传统的神的权威和人(圣人)的权威被真理(实质是科学方法论)的权威所代替。人开始能够用自己的感觉支持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思想支持自己的感觉,而不假他求。鲁迅作为中国现代一个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就是其坚韧性。正是这种坚韧性使他同西方那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具有了共同的特征,使他同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伏尔泰、卢梭、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左拉、马克思、列夫·托尔斯泰、柯洛连科、尼采这些西方知识分子在精神气质上有了相通之处。我们过去常说鲁迅的这一特征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实际上,与其说它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那种“骨气”,不如说它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的表现。中国古代文人的那种“骨气”是没有一种理性精神做基础的,是在固有的社会价值标准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它自身不具有独立的个性的价值。而鲁迅的“骨气”则是在自己的独立选择中表现出来的,它自身就具有一种文化的意义。只有“科学”,才不是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的东西,才不是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的道理。它在相对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绝对

性,在偶然性的基础上找到了必然性,在没有确定性的背景上发现了确定性。从而为人类的进步,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相对坚实的基础。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进步;有了科学,就有了真正的进步。人类的进步、人的发展是在有了科学之后才实现的,因为只有科学、只有理性,做的才不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运动。鲁迅和西方近现代这些杰出的知识分子是在科学意识、理性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内在的联系。他们都是真理的发现者和真理的捍卫者。他们都不是仅仅为了博取社会的荣誉而谨小慎微地维持着自己的道德外观的伪君子、假圣人,他们都在科学意识、理性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真正的自尊心、自信心。这种科学意识,这种现代理性精神,并没有影响他的直观、直感、直觉的敏感性,并没有降低他的激情的强度。相反,它们是使他能够进入更高的社会激情状态的坚实的基础。他还是一个文学家,但已经不是像中国古代那样的一些文学家。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不可能创作出他的《呐喊》、《彷徨》、《野草》这样的作品来,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杂文家。他的文学创作是在现代理性的高度起跳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新文学作家都是以鲁迅这样的态度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的。新文学领域的开拓为脱离开科举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找到了发挥自己才能和智慧并在现代中国社会立足的阵地,但其中的很多人对自己,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精神发展并没有真正浓厚的兴趣和内在的激情。他们仍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主要把文学作为显示自己的才华、获得社会接受和认可的方式。一当他们依靠成名前的那点人生体验和人生经验成了享誉社会的文学作家,他们便充满了志得意满的感觉,他们的人生体验和人生经验就在一层“名人”的雾霭里变得朦胧模糊了。他们是站在“名人”的立场上感受周围的世界,积累自己

的人生经验的,但这不是读者需要感受和体验的世界。他们的思想和创作的根无法扎到人性的深处,而是作为一个“文学家”从别的文学家那里接受过来的。有的从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中接受过来,有的从外国文学传统中接受过来。他们把中外文学作家的作品作为自己的范本,把他们的经验当做文学创作的秘诀,认为从这样的范本中获得的这些秘诀就是把自己造就为伟大文学家的方式。他们创作的兴趣仅仅建立在公众的赞誉中,他们在任何人、任何形式的赞誉中都感到满足,感到被赏识的愉悦,而在任何人的任何形式的批评中都感到懊恼,感到被歧视的羞辱。他们寻找着“知音”,也被“知音”牵着鼻子走。在他们还有“知音”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对自己的思想和创作道路产生任何的怀疑,并对外部的批评采取着绝对排斥的态度。他们就把这种排斥态度视为自己的“个性”,视为自己的清高,但当遇到了真正的社会压迫,特别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群众舆论的联合压迫时,他们便会很轻易地放弃它们,并且在“转换立场”之后马上可以找到完全否定自己的理由。他们就把这种转变视为自己的“进步”,视为“虚心”接受别人批评的表现。有两种文体是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所独有的,即大批判文体和自我检查文体。前一种文体是得势时的文体;后一种文体是失势时的文体。这说明我们既不能科学地、客观地对待自己,也无法科学地、客观地对待别人。文学家是较之一般人有更丰富的感情的,是较之一般人有更丰富的想象力的,但这种感情和想象力却不能没有一定的理性基础,不能今天把一个人想象成一个救苦救难的菩萨,明天又把同一个人想象成一个十恶不赦的魔鬼;今天把自己想象得像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毫无瑕疵的圣人,明天又把自己想象得像是一个一无所知、一无所晓、没有任何优点的小丑。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与我们的社会处境有关,但却不能不说,我们自己缺乏必要的

科学意识和理性精神也是导致这样的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科学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缺乏不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家处世应人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家文学作品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总感到鲁迅的思想是“偏激”的,但几乎只有他对中国人及其关系的描写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为什么?因为他抓住的不是一个人物在一时一地的表现,而是决定着这种表现的内在精神基础。在这里,表现出了鲁迅对社会、对人生、对他笔下的人物及其行为真正的科学态度。他对他们是有各自不同的感情态度和审美态度的,但这种感情态度和审美态度却不是通过有意美化或丑化对象而实现的。他没有把鲁四老爷写得更坏,也没有把阿Q写得更好;没有把鲁镇上的短衣帮写得更善良,也没有把他们写得更残酷。因为他眼里的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的。直至现在,我们的文学家还常常是通过美化或丑化对象而表现自己的感情态度和审美态度的,并把这种故意美化或丑化称为文学的“典型化”,称为作家的“主体性”,岂不知恰恰是这种故意美化或丑化的方式,使我们的作品失去了整体的统一性,失去了真实感人的力量。文学艺术确实像一个“美丽的谎言”,但却不能仅仅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服装表演”展示的服装不都是能够穿到大街上去的,但它至少在舞台上是可以穿的,不能是“皇帝的新衣”。我们的文学艺术也是这样,它们不是生活教科书,都不能起到指导生活的作用,但至少作为文学艺术作品还能让人感到是真实的、真诚的,不能让读者感到作者是在制造一个有意欺骗他们的谎言。这就需要文学艺术作品有点真实性、真诚性。需要文学家艺术家有点直面现实、直面自己、直面人生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

在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历史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原本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的,是近现代人文主义思潮中的不同组

成部分。但在中国,这三个部分似乎从来没有构成过一个整体。我们的文学艺术家、社会科学家向来是鄙视实利主义的,而我们的科学技术恰恰是在实利主义的目的下发展起来的。我们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向来是鄙视浪漫、提倡理智、反对感情用事的,而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却不能不有点感情用事,有点浪漫,有点不够理智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家、自然科学家向来是厌恶高头讲章,厌恶抽象的理论的,而我们的社会科学家从事的恰恰是搞高头讲章、搞抽象的理论的工作的。“五四”刚过,我们就进行过一场“问题和主义”的论争,似乎“主义”和“问题”就是两个对等的、相互排斥的概念。似乎问题就不用上升到“主义”的高度来认识,似乎“主义”可以脱离开具体的社会问题来信仰、来主张。稍后我们又有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似乎二者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对立着的概念,似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就不是“玄学”,不是现代哲学、现代社会科学构成的基础,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不包括人类的科学技术活动。到了现在,我们还在进行着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讨论,似乎科学技术不属于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也不包括科学技术。当然,在西方,也可能有过类似的讨论,但西方与我们是不同的。在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几百年间,近代文学艺术、近代科学、近代社会科学是像一个合抱的大树一样一起生长的,它们共同着生命,共同着营养。只是当进入了资本主义的阶段,到获得了自己自由生长的权力,它们才分了枝,分了叉,成了相互制约而又不能压抑彼此的正常发展的不同领域。而我们,几乎在根部就被分裂开来。它们之间缺少一个结合部、连接点,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被纳入到传统观念的控制之下,并因此加深了彼此的分裂,强化了彼此的矛盾,压抑了各自自由发展的机制,并构成了一种畸形的文化系统。就其每个部分,都像是现代的,但就其整体,仍是传统的,陈旧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更进一步思考鲁迅重视法布尔《昆虫记》所内含的意义。这种意义可能不是鲁迅自觉意识到的,但他的直觉也可能给我们许多的启示。

## 5

法布尔的《昆虫记》首先是一部伟大的自然科学著作,并且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科普读物。科普读物是把科学家已经由其它自然科学家研究发现的自然科学的知识用浅显易懂、通俗自然的文字叙述出来的著作,它起的是将自然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普及到更广大的社会群众中去的作用。科普读物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但法布尔的《昆虫记》却不是或不简单是这样的著作。法布尔的《昆虫记》叙述的不是别人的发现,不是把原本很深奥的道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道理,而是他的研究成果本身。这样的著作理所当然地应被视为自然科学的著作,至少应当被视为自然科学著作的一种形式。在这里,它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什么是科学研究?是不是只有那些我们认为有更深奥科学技术知识的少数人进行的那些专门化很强的求知活动才能称得上是科学研究?我们是在没有一个明显的科学传统的历史中走过来的。当我们同西方科学刚刚接触的时候,西方科学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有了一连串的科学成果。我们需要把这一连串的科学成果尽快学到手,于是首先输入的是西方学校的教科书以及与教科书相类似的著作。于是我们有了《代数学》、《几何学》、《高等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等等自然科学的教科书,并且把这些教科书理所当然地当做了数学、自然科学著作。其实,他们是数学、自然科学的著作,但却是把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数学、自然科学成果联系起来的方式,而不是科学研究活动的本身。与此同时,由于我们是在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中途接受西方的科学的,在西方每一自然科学的部门,都已经积

累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每一个自然科学家的研究都是在这样一些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不能或很少能从基础概念开始叙述，他们是以公理、公式、定理的形式运用过往的研究成果的，并以这种形式表述自己新的发现，这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数学、自然科学的论文或著作。每一个这样的论文和著作，都是一个高度简化了的思维形式，它们把此前所有扑朔迷离、复杂多变的活生生研究过程都浓缩在了由公式、定理所体现的枯燥结论中，使它们成了用公理、公式、定理构成的一架架阶梯，只有登着这一个个阶梯，我们才能理解他们的新的研究成果。毫无疑问，以上两种形式确实是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的两种形式，但却不是唯一的形式，更不是科学发生学意义上的形式。在我们这里，这大量的公理、公式、定理像一堵又高又厚的墙，把广大的社会群众、广大的青少年挡在了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我们感到科学研究只是那些念完了这些教科书的硕士、博士的事情，是已有高深自然科学知识的自然科学家的事情，而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事情。为了进行科学研究，我们必须通过自然科学教科书的大量公理、公式、定理的阶梯。所有这些，都只是为将来的科学研究进行的必要的准备。我们一代代的青少年必须首先掌握这些公式、定理，然后才有可能从事自己的科学研究。科学的道路就是这样一个先受教育后做研究的道路。在这个道路之外才是自己的生活，只有生活才是轻松愉快的；科学需要的是付出，是劳动，是艰苦，是一点一点积累知识的过程。直至现在，我们还不能绝对地否定这种认识的合理性，但当我们把法布尔的《昆虫记》纳入到自然科学著作的视野中来之后，我们自然就会感到，科学研究并不仅仅是这样的，并且从根本上讲，科学也不应是这样的。科学，同文学艺术一样，是直接发源于生活的，发源于儿童的，正像每一个儿童从很小时候起就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努力

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别人，就在进行着最初的口头文学创作，他们也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在开始感受和思考外部的自然世界，就在进行着本质属于科学研究的活动。科学研究就产生在儿童和整个人类的好奇心以及为满足这种好奇心而进行的实际观察和思考之中。当一个儿童开始用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试图满足自己对自然世界的好奇心的时候，科学研究实际就在他那里开始了。法布尔对昆虫的研究不是在他掌握了大量公式、定理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在童年的时候就开始了。他出身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里，他的童年是与花草虫鸟一同度过的。不是任何实利主义的目的驱使他去观察研究这些昆虫的，也不是公式、定理给了他这种研究的可能，而是他对自然世界的好奇心，是他对昆虫的浓厚的兴趣。他要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要在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的基础上明白一个究竟。实际上，这也是所有自然科学家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活动的本质之所在。还在他六岁的时候，他就曾向自己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我是用嘴巴还是用眼睛来享受这灿烂的阳光呢？为明白这个问题，他自己做了试验。他张大嘴巴，闭上眼睛，阳光在他面前消失了；他张大眼睛，闭上嘴巴，阳光又重新出现了。于是他明白了是眼睛而不是嘴巴能够享受阳光的灿烂。人类全部的自然科学研究都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像我们在数学、自然科学的教科书和数学、自然科学的论文专著中所感到的一样，是在公理、公式、定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直至现在，儿童的好奇心和整个人类的好奇心仍然是一个较之现有的科学研究领域更广大无比的科学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还会陆续产生与现有的学科不同的新学科，新领域。法布尔的成功是他始终保持了对昆虫世界这种童年的好奇心，为了满足这种好奇心始终坚持了对昆虫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书

写了属于自己的科学研究著作。我们仍然应当指出,这种形式不是唯一的科学研究形式,但却是一种可能的科学研究形式,是从发生学的意义上体现着自然科学研究特征的一种形式。因为所有的科学研究领域在最初建立的时候,都不是由大量公式、定理构成的,而是在实际的观察、体验和思考中建立的。

当我们充分思考了法布尔的《昆虫记》这样一部自然科学的著作,再返转来理解数学、自然科学的教科书一类的著作,我们就会感到,这些著作并不只是、甚至并不主要是知识的积累,而是一个个独立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活动。只是这些研究课题和研究活动是前人已经完成的,有了比较确定的结果的。对于教科书所叙述的一切,可以是让青少年学生“学习”的,也是可以供他们“研究”的。数学、自然科学的教学活动可以是教师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告诉学生、让学生记忆并运用的过程,也可以是在教师的引导下青少年学生根据已学过的知识独立地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破解自然之谜的过程。我们现在说要重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怎样培养起来的?是在学生自己观察、自己思考、自己破解自然之谜的过程中才能实际地培养起来。虽然教科书上的“谜”都已经是有了谜底的“谜”,但这一个个解谜的过程却是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学习”是中国固有的一个文化概念和教育概念,“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sup>⑩</sup>这里的“学”是对别人的知识、才能、品性的效法;这里的“习”是把从别人那里学到的知识、才能、品性反复进行练习、学习。朱熹注曰:“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sup>⑪</sup>实际上,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流行的还是这样的“学习”的观念。这样的学习观念不但不能培养出国民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且是扼杀国民创造

性思维能力的手段。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在研究活动中培养起来的,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由已知求未知的能力,不论前人是否已经获得了这种知识,在研究活动中,新知都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而不是直接从别人那里接受过来的。我们可以称这个过程是二度创造过程,但一度创造过程(原创性过程)同二度创造过程几乎是相同的,只不过过程可能更复杂,道路可能更曲折,要求的想象力也更加丰富。总之,数学、自然科学教科书的叙述过程理应视为无数个像法布尔的《昆虫记》一样的科学研究过程的浓缩形式,而不是唯一合理的科学著作的形式。对于现在流行的数学、自然科学论文、论著的叙述方式,也应作如是观。

法布尔的《昆虫记》作为一部自然科学的著作,其特点之一就是不仅仅记录了他的观察的结果,亦即不仅仅有“科学的结论”,更展示了他观察的过程和观察的方法,亦即研究的过程和研究的方法。在这里,我认为它能给我们的第二个重要启示是: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到底是结论更重要,还是过程更重要?如前所述,我们之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是在强烈的实用主义目的之下进行接受的。这种实利主义的目的首先重视的是结论而不是过程。而在我们当代自然科学的教科书和论文、论著中,出现的也主要是一个个研究的结论,即使在论述过程中使用的公式、定理也无不是前人已经证明是正确了的一些结论。对于结论的崇拜与对于过程的轻视就成了我们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实际上,从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就习惯了一种“语录式”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的“圣经”《论语》就是一部语录式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有《毛主席语录》、《马恩列斯语录》、《鲁迅语录》。直至现在,我们的读书还常常是在书中寻找说得精彩的话,寻找语录。这些语录实际上就是各种不同的结论,各种不同的判断,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常常是从这样一个语录蹦到那

样一个语录的过程,最终证明的又是一个现成的语录的正确性。就像从这个山头蹦向另一个山头,最后又蹦上一个更高的山头一样。实际上,在自然科学以及所有的科学研究中,结论是重要的,但过程则更加重要。几乎每一个研究过程,都是极为复杂的,都显现着较之结论更丰富的意义。哥白尼所证明了的地球围绕太阳转的结论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常识,但哥白尼发现这一真理的过程却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实现的;哥德巴赫猜想的结论已经被我们所了解,更重要的已经不是这个结论本身,而是证明它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最终证明的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但我们仅仅记住这样一个结论并不等于懂得了《资本论》,它的论述过程本身的意义比这个结论的意义不知要大多少倍。与此同时,同样一个过程是可以走向各种不同的结论的。达尔文根据自己的生物学研究得出的是物种进化论,而法布尔根据自己的昆虫学研究得出的是物种不变论,实际上,他们的结论的不同并没有影响他们研究过程的意义。他们都在生物学的研究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我们这里,争论的常常是结论的意义,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出现论证达尔文进化论正确与错误的文章。实际上,并不伴随具体、丰富的研究过程的这种争论,对我们是毫无意义的。像我们关于这种主义和那种主义的争论,充其量都只不过是一些名目的争论。唯物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并没有阻止我们58年的吹牛风,现实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并没有阻止我们文艺上的“高大全”。各类科学研究的结论都必须同其研究过程结合起来进行理解和掌握,脱离开具体过程的结论往往只是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教条。“抓住实质”、“抓住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教诲,而我们也常常是在这种“实质”、这种“精髓”上摔下来的。与此同时,一个科学成果的取得,可能经过几个世代的许多科学家的研究和探讨才

能正式完成,在这整个过程中,很多科学家所做的都是逐渐趋近终点的工作,最终完成者的意义是巨大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贡献的科学家的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成功者是重要的,但那些在失败中为最终的成功积累了有益的经验的一个个失败者也是重要的。而从人类认识世界的整个过程而言,我们所有的科学研究成果都是人类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一些环节,最终的结论是没有的,这个认识过程就是我们的一切。总之,结论是重要的,过程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法布尔的《昆虫记》对于我们有为其它的科学著作所无法代替的意义,因为它向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他的研究结论,更是他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的综合体。它对形成我们完整的科学意识是有启迪意义的。真正的科学意识不是记住了多少科学的结论,不是背过了多少教条,而是对世界的真正的理性态度,是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完善,是通过科学探讨过程发现真理的能力的提高。

西方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走向了分解、分析,这是自然科学研究走向更加繁荣、更加深入的标志。我们从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中途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也就把西方这种研究方式输入到了中国。但是,这种分解、分析的方法却不是唯一合理的方法。法布尔的《昆虫记》采用的则是与当时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不同的研究方式。关于这种方式,法布尔写道:

……这种遗憾的缺陷最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普遍采用的方法是肤浅的。人们抓住一只昆虫,用一根长大头钉把它们钉在一个软木底的盒子里,在它的腿上系一个写着拉 兹字的标签,于是关于这个昆虫的一切都在上头了。我不满足于以这种方式了解昆虫史。人们告诉我,某种昆虫触角有多少关节,翅膀有多少翅脉,腹部或者胸部的某个区域有多少根毛,这都毫无用处。我只有在了解了它的生活方式,它的本能,它的习性后,才能真正认识这种昆虫。<sup>⑩</sup>

在这里,法布尔所阐释的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一种是将对象分解、解剖,分别认识它的各个部分的研究方法,一种是将对象作为一个整体,考察这个整体的各种性能和表现的方法。具体到昆虫学的研究,前者是把昆虫作为一个没有生命的各个不同器官之和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后者则是把昆虫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整体进行研究的。法布尔采取的是后一种的研究方式。正像鲁迅所指出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那种分解的、解剖的研究方式,但法布尔的《昆虫记》也向我们表明,我们同样也不能否认后一种研究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后一种研究方式更带有基本的性质。认识事物,首先要认识它的整体,认识它的整体的性质、作用、机制和运动形式,只有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才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它的各个部分,我们认识部分仍然是为了更具体、更细致、更精确地认识整体,认识以整体的认识方式所不易发现的那些特征、那些效能。将一个整体以分解的形式进行的考察研究并不是对整体的考察研究,因为任何整体都不是部分之和,但我们可以通过把部分的认识返回整体并考察它在整体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以及与其它因素的联系的方式将其转化为对整体的认识。所以,在整个认识过程中,整体的考察和研究是其基础,也是其终结,脱离开整体的部分的研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并且有时候会导致对整体的谬误的判断。这种以部分代整体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自然科学研究中有无表现,我不知道,但至少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科学灾难。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任何一个场合下都能为流行的、权威的观点找到“科学”的依据,就其部分,这些依据可能都是真实的、科学的,但就其整体则不但不是真实的、科学的,反而更严重地扭曲了整体的性质和作用,对整体的发展起到的是破坏的作用。在社会实践中,我们采取的往往是培养“典型”、推广“典型”

的方式。就其“典型”,未必是完全虚构的,但這些“典型”所具备的条件却不是所有地区、所有单位都具备的,这种“典型”一旦推广到整体,对整体就会造成严重的破坏。总之,法布尔的《昆虫记》在科学方法上对我们的启示也是重要的,它让我们永远不要把整体切割成碎块并以对这些碎块的研究代替整体的考察和研究。

## 6

法布尔的《昆虫记》不是在公理、公式、定理的基础上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而是在自己实际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他记述的不仅是他观察、研究的结论,而是他研究的全过程;他不把研究的对象分解成失去了整体感生命感的各个组成部分、各个没有生命的器官,而是把昆虫视为一个个有生命的整体,研究它们的生活方式、习性和本能。所有这一切,使他这一部自然科学著作同时具有了文学作品的性质。在这里,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文学和科学之间有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科学可不可以同时是文学的?文学可不可以同时是科学的?在我们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炮击而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厉害”时,我们几乎是一次性地将文学艺术同科学技术分别开来。在那时,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文化中也有科学技术,也有“物质文明”,但我们有伦理道德,有诗歌绘画,有“精神文明”。而西方“长”的是科学技术,是“物质文明”。这两个东西好像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现当代的教育和现当代社会的分工把我们这种观念更形强化起来,凝固起来,在我们的意识之中永远存在着科学技术同文学艺术之间的一道鸿沟。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文化中并不是没有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除了那些零散的专门的科学技术著作之外,我们中国古代诗人也有许多细致的自然观察,但被我们尊为圣贤的古代思想家关心的更是治国之术,关心的更是以尊君孝父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为此目的他们在人与禽之间、

人与物之间划了一道明确的界限,使我们诗人的自然观察仅仅停留在直感的印象之上,并无意不断完善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所有的自然观察只是浅尝辄止,上升不到更高的理性认识的层次。这种倾向对我们文学艺术的发展也不是没有影响的,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压抑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那些观念同时也是压抑着我们文学艺术发展的东西。对物、对禽的那种大而化之的了解,同时也带来了对人、对社会、对人生的大而化之的了解,在传统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建立起的粗疏的、扭曲的好人和坏人的观念直至现在仍然是阻碍我们文学艺术正常发展的主要原因,我们对人的生活方式,人的本能的和社会的习性,对人的情感情绪的变化和发展,对人的心理的意识状况,都缺少西方文学中自然可感的精细的观察和科学的了解,而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情感情绪的、审美的主体态度是不可能构成一个真正完整的文学世界的。与此同时,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仰赖文学艺术自身又在多大程度上仰赖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也是无法明确划分的。没有对人、对人类社会、对人的心理的、思想的、情感情绪的科学的了解,能有西方近现代小说、戏剧的持续发展和繁荣吗?总之,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在其内在的精神上从来不是截然分开的。但是,当我们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成果时,科学技术的文体形式和文学艺术的文体形式到底发生了严重的分化。科学技术的文体抽去了研究者主体的精神,主体的情感情绪和审美的态度,留下的只是一个被高度抽象化、客观化了的符号体系,而西方的文学艺术则在强化其主体精神、强化其情感情绪特征的道路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使我们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时形成了彼此严重对立的感觉。而法布尔的《昆虫记》则是一个特例,几乎只有它才兼具了严格的自然科学性质和文学艺术性质这两重特征。它是一个特例,但这个特例

却可以把现代科学和现代文学的联系异常鲜明地表现出来。

法布尔的《昆虫记》作为一部杰出的艺术散文的艺术性与作为一部杰出的自然科学著作的科学性实际上是共生共存、融为一体的。它的科学性表现为对昆虫生活方式、本能习性的几乎是超细致的观察,而这种超细致的精确观察在艺术上的表现就是它的超细致的精确的艺术描写,这是为任何一个专门的艺术家的也无法达到的。细致而又精确就是一种美,就是一种理趣,因为只有较之前人更细致的观察和了解,才能发现常人所无法发现的东西,才能够出人意表,给读者一种惊异,一种感动。在这里,法布尔对于昆虫世界的描写有与巴尔扎克对于法国社会的描写的那种超细致性和超精确性,科学的细致性和精确性在他们这里都同时构成了艺术上的美感。真与美在这样一个境界中是统一的。科学原本是由已知求未知的过程,它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在法布尔的《昆虫记》中,这种科学求知的动态过程同时也表现为艺术散文的情节因素,它随着一个自然科学家的研究过程而逶迤伸展,随着真实的研究过程而或滞或流,或缓或急。这就有了情节,有了情节的美感。科学家领着我们从昆虫世界的外层空间逐渐深入到它的内部空间之中去,这里有许多我们常人所未曾看到过的情境,未曾发现过的过程。它的艺术上的新鲜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的科学上的发现不是直接告诉我们的。我们同科学家一起经历了这个过程,一起体验了发现的乐趣。科学的发现同艺术的情节不仅是同构的,而且是同一的。这个同一的过程,是由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一起构成的。观察者带着主体的情味进入这样一个观察实验的过程,被观察者在这个过程中向观察者逐渐呈现出自己的真实,自己的生活 and 习性。这里有一个观察者的心理流动线,也有一个被观察者在观察者面前表现自己的过程,主体与客体乍合乍离,把二者有机

地组织在了一起。所有这一切,都把科学的研究同艺术的创作融合在了一起,使这部严肃的自然科学著作同时也成了一部优秀的艺术散文。在中国现代,有“科学”和“文艺”之分;在中国古代,有“理趣”和“情趣”之分,而在法布尔的《昆虫记》中,“科学”也是“文艺”,“文艺”也是“科学”;“理趣”也是“情趣”,“情趣”也是“理趣”,二者达到了完美的同一。

法布尔的《昆虫记》对于我们的社会科学的意义,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但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整体感受来触摸它的意义和价值。法布尔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的昆虫,而是一个昆虫的世界。在这个昆虫的世界中,生活着各式各样的昆虫。它们都有着自己的生命,都靠着自己的本能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它们的本能特征各不相同,它们赖以生存的能力各异,它们的生命有长有短,它们有各自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道路。它们之间也会发生各种形式的矛盾和斗争,有着各自的利害和冲突。所有这一切,都与人类社会没有什么不同。在这里,有一个如何感受和看待昆虫世界的问题,也有一个如何看待我们人类自己的问题。鲁迅不是一个宗教的信徒,我们也不是一个宗教的信徒,我们不必像有些宗教家那样遵守“不杀生”的宗教戒律,但人类也是一个生命的存在,这里就有一个如何对待生命的问题。爱惜生命也就是爱惜自己,憎恨生命,同时也是憎恨自己。对于生命的态度不仅仅是如何对待外部世界、对待昆虫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人类自己的问题。生命与生命之间是有冲突有矛盾的,为了自我生命的存在有时不能不毁灭别个生命。我们会打死饭桌上的苍蝇,杀死居室之内的蚊虫;杀猪羊以营养自己的身体,挤牛奶而夺它个生命的产品。但所有这一切都应有一个限度,即不是在毁灭一个类群的意义,不是以毁灭别个生命为乐趣、为享乐,而是在维护自我生存的意义上发生的。它必须维持在一个最低的限度,维持在生命与生命的直接冲突

中。除此之外,我们的任何对生命的漠视、对生命的残害,都会同时表现在人类社会中。特别是那些以残害别个生命为乐趣、以欣赏别个生命的痛苦为享受的倾向,同时也必将表现为对人类的残酷。因为人类与人类之间的矛盾更直接,更激烈,而人类在生命受到摧残时的痛苦更具有观赏性。我们人类有了文化,有了科学技术,有了为任何动物类群都无法比拟的智慧和才能,有了实现自己目的的更高超的手段。但所有这一切,都同时发展了人类中心、自我中心的倾向,都发展了对外部世界的漠视。似乎自我可以完全仰赖自己的力量和才能,外部世界除了臣服自己的意志之外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我们在无限地增长着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却往往严重地忽略了别个生命的需要。我们更严重地丧失了对别个生命的热爱和尊重。正是这种人类中心论、自我中心论,我们在昆虫世界里建立了益虫和害虫的概念。这个益虫和害虫的划分完全是以人类的利害为标准的,并且是对昆虫类群的整体判断。在这种划分的基础上,我们进行的是消灭一个个昆虫类群的活动,我们失去了它们各自与人类的特定的关系的感觉,增长的是对一个类群的集体性恐惧和憎恨。即使对我们认为益虫的昆虫,为了一己的眼前利益甚至一时的乐趣,也毫无顾惜地加以扑杀。我们漠视它们的生命,在它们的痛苦和死亡面前无动于衷。实际上,这种对动物、对昆虫的态度不也是我们对人类、对他人的态度吗?我们自然在昆虫界划分了益虫和害虫,我们就很自然地在人类中也可以划分出好人群和坏人群。我们自然不必考虑一个昆虫类群中的这个昆虫和那个昆虫以及它们与我们构成的各种不同的关系,我们也就不必考虑被我们判定为坏人群中的这个人 and 那个人以及他们各自与我们构成的不同关系;我们自然可以对被我们判定为害虫的昆虫类群进行集体性的扑杀,我们也就可以对被我们判定为坏人群的人进行集体性的毁

灭；我们自然将我们认为是益虫的昆虫类群也可以为了一己的眼前利益或一时乐趣而进行扑杀，我们也就可以为了一己的眼前利益或一时乐趣而对我们认为无辜的人进行残害。这里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东西，因为生命与生命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对于昆虫生命的漠然同时也是对人类生命的漠然。而失去对生命的热爱、尊重和同情，人类就只有一个标准，即自我的眼前的利益和一时的精神乐趣。在昆虫面前，人类是强者，对昆虫的虐杀以及虐杀的乐趣，就是强者对弱者的虐杀以及虐杀的乐趣。这在人类中造成的是强凌弱、大欺小、富压贫，造成的是人类之间的仇恨和残杀。所有这一切，都与我们社会思想发生着直接的联系。法布尔的《昆虫记》散发着对昆虫世界的关切，对昆虫生命的亲切。法布尔不是把昆虫世界作为人类的敌人进行研究的，而是作为一个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独立世界来认识的。他加强的是这两个世界的沟通，而不是这两个世界的相互仇视。这对于我们社会观念的建立和完善也是有不可忽视影响作用的。

我认为，只要从以上几个方面思考鲁迅对法布尔《昆虫记》的态度，我们就会感到，鲁迅对它的重视不是没有根据的。他不仅着眼于它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更着眼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和国民性的改造。他特别强调了它对中国青少年的意义。我们更重视我们的青少年将来成为一个什么家，鲁迅则更重视他们在一个什么样的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个性。法布尔的《昆虫记》不能代替其它的科学技术著作，不能代替其它类型的文学艺术作品，更不能代替其它的社会科学研究，但所有这一切，得有一个生发的基础，得有一个相互连接的层面，而法布尔的《昆虫记》就是在这样一个观念层面上不可多得优秀作品。

注 释：

- ⑩ 《论语·学而》。
- ⑪ 朱熹《论语集注·“学而时习之”注》。
- ⑫ 法布尔《昆虫记》第一卷第94页，梁守锵等译，花城出版社2001年1月版。

2001年7月30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消息·

## 《鲁迅改造中国国民性思想研讨会》

4月6日在鲁迅博物馆举行

《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与浙江宁波高等专科学校于2002年4月6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举办了《鲁迅改造中国国民性思想研讨会》。会议就中国国民性的“原点”和“密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鲁迅研究月刊》下期将刊发研讨会上的发言。